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终极亲密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徐伟珠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van Klima

终极亲密

Ivan Kli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徐伟珠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极亲密 / (捷克) 克里玛著 ; 徐伟珠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10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7316-6

I. ①终… II. ①克…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捷
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010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THE ULTIMATE INTIMACY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í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陈诗泳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终极亲密

ZHONGJI QINM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 2 插页

字 数 34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终极亲密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无望存在的镜像、反思和质疑

(中译本前言)

徐伟珠

伊凡·克里玛(1931—)是捷克当代著名的小
说家,昆德拉的同时代人。童年时在特雷津集中营度
过三年半炼狱生活,目睹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死亡,这
段苦难经历为他走上作家道路做了铺垫。中学时因暗
恋一位女生捉笔写爱情小说,把深藏心间的萌动诉诸
笔端。一九五一年进入查理大学哲学院攻读捷克语言
和文学专业,一九五三年加入捷克共产党。相继在
《五月》周刊、作家出版社任编辑,一九六三至一九六
九年出任捷克《文学报》副主编,此刊物具有很强的
艺术思想性,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为重要的思想
交流阵地。一九六七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
次代表大会上,克里玛因和昆德拉、哈维尔等作家公
开抗议捷共对文化的控制,抨击其审查制度而被开除

出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捷克大批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禁，克里玛同样没有幸免，他从美国一回来即受到迫害，作品遭禁。在此后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以各种体力劳动为生，作品大多由地下出版或国外的流亡出版社发行。

半个多世纪的辛勤笔耕，克里玛创作有二十多部小说、随笔录和剧本，大部分被译介到国外，达三十一一种文字，荣膺多种文学奖项，成为世界瞩目的捷克作家之一。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三年出任捷克笔会俱乐部主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捷克作家，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表现出现代人的失落和身处强大压力下的孤立无援感，这自然使得他们的创作贴近卡夫卡。克里玛也不例外，他的创作题材可谓广泛，但基本着陆于性爱和社会现实两大主题：在没有了上帝的世界里，人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望；人作为个体与强大政权之间的冲突，在特殊的表达中让读者感受人物命运的苦涩、挣扎和寻求慰藉。捷克人善以自嘲、调侃摆脱尴尬与困境，以幽默、讥讽作为生存和抗争的倚仗和凭借，这也是捷克文学历代秉承的传统。

《终极亲密》问世于一九九六年，可视为其小说《爱情与垃圾》(1987)主要情节的变奏，延续了克里玛一贯的创作主题：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找永恒之爱，展现人在群体中的被抛弃感、孤独感。小说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捷克变革后的社会现状为背景，描写有家室的福音派牧师丹尼尔·维德拉遭遇危机，感觉灵魂迷失，无力走近他人，产生信任关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从事至今的牧灵活动的意义。过去他的教职遭到体制的压制，个人生活也经受重创，年轻的妻子伊特卡病逝，对此他无法释怀，影响到他与现任妻子汉娜的关系，他经常把汉娜与死去的前妻相比较，感觉达不到那种刻骨铭心，甚至情人芭拉的脸也让他想起前妻。

他承认自己的信仰在逐渐失去，当他爱上犹太女人芭拉，以前平

静安全的世界顷刻间坍塌，因为禁忌的婚外情的罪恶感，以及面对妻子和孩子们的内疚和挫败感。为了掩饰秘密，他被迫过着心力交瘁的双重生活。事实上，男女主人公的恋情折射出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寻求及其丧失的潜台词，也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维度，表达了怀疑、抑郁、对死亡的恐慌和原有的安全感崩溃时寻找支撑点的努力和探讨，最终丹尼尔面对两个他已然不属于或者不曾属于的精神和世俗世界，陷入无所适从的矛盾境地。

丹尼尔的牧师身份在教区备受推崇，自觉肩负社会责任。他竭力想帮助前假释囚犯彼得，试图扭转他的信念。当他得知女儿怀上了彼得的孩子时，不由产生了深深的价值观危机，开始怀疑世界的本质，怀疑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疑虑越来越大，最终做出放弃牧师职位的决定。在小说结尾，牧师哀叹自己“承受住了压制时期，却无力抵御自由时期”。小说还范围广泛地跟踪了一九八九年捷克革命后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私有财产归还、国家安全部门合作线人名单、贩毒、宗教派别等主题。

小说的核心始终围绕“亲密”展开，对家人，对他者，对自己，甚至面对上帝的私密和坦诚。对此克里玛绝非偶然地运用了真实体的创作手法，以大量独白、日记、书信和梦境描写，那种潜意识里的本真和心理活动倾吐，凸显了当今时代最迫切的追问：我们是否依然有希望给予生命有意义的秩序，拥有爱的权利？是否依然有信心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小说的叙事模式和整体结构准确呈现在八个无标题的章节里，每一章包含八个附有标题的副章节，分别为：

- 一、现时叙述，主人公丹尼尔的现实世界。
- 二、丹尼尔的日记摘录。
- 三、丹尼尔的现实世界。
- 四、描写其他四个主要人物之一：丹尼尔的妻子汉娜；或汉娜的潜在追求者、记者马修；或丹尼尔的情人芭拉；或芭拉的丈夫萨姆

埃尔。

五、丹尼尔的现实世界。

六、描写上述四个人物之一。

七、丹尼尔的现实世界。

八、书信，书写人和接收者均为丹尼尔。

克里玛着笔于看似普通的生活危机，小说中人物的多种视角互不关联，需读者回溯把他们串联起来，借助行为人的眼睛走近危机。随着读者对危机境况的深入透视及人物心理活动的把握，事件的相对性失去，呈现其明确的必然性，人物也越鲜明起来。主人公的致命危机通过诸如生活空虚、困惑、孤独和力图逃离等主题，得到凸显和加剧。不妨这么说，小说的几位关键人物都置身于极端的境况下，危机四伏、面临突破的境况下，他们为即将来临的变化缓慢而不易觉察地做着铺垫和准备。

作者匠心独运，精心设置了呈对立的写作体系。首先是主题的对立，即体现在主人公丹尼尔和芭拉身上的危机和困惑：找到信仰及信仰的逐渐失去；其次是构架的对立：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与第一人称的日记和书信相交叠。主人公面对日记，其实面对的是自己，是其内心世界的直接反射或自省，从而他表现出最大的坦诚和真挚，袒露一切，自行分析问题及其结果。梦境作为良知谴责和矛盾心理的潜意识符号，解读梦境让丹尼尔成为自己的心理分析师，梦也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概括——对信仰的失望、谎言、古老家园的失却、心灵找不到新的归宿、异端的排斥。书信是小说叙述中另一种真实的创作手法，书信作为不在场人们之间的交流，在纸上直抒胸臆，可以道出差于或不便直接道出的话语。书信印证了芭拉和丹尼尔之间发端于对信仰、恒久真爱等问题的探讨到情感火花燃起和急速升温的过程。

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让克里玛反对任何形式的狂热，他在《布拉格精神》中指出：历史充满了叛乱和颠覆，占领、解放和新的占

领，成为负荷进入人们的生活，进入城市，不断提醒我们生命的不确定性。他说：我目睹并经历了方式各异的迫害和狂热行为，作为二战的幸存者，我把宽容，对种族、民族、他人观点的包容视为重要的品质，唯有这样，不同语言、不同传统或不同政治体制的民族才能趋于相互理解，对此文学的作用不容忽视。

借用菲利浦·罗思的话，克里玛“历经所有欧洲式的教育——自特雷津集中营的死里逃生到正常化时期的政治迫害”。所以他能平和坦然地面对生活的突变，在朋友们眼里他始终是“好消息的使者”。经常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们称他为“典型的中欧知识分子”，其中的寓意却很难说清楚。克里玛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认为它不够准确：“我更愿意别人称我为作家。”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